**税收成本、税基转移与企业进入**

**——来自2018年生产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调整的证据**

**内容摘要：**税收体系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税种之间存在协同和互动效应。对于同一纳税对象，若不同组织形式企业的课税模式不同，产生的税收成本会存在差异，由此可能引发以避税为目的的跨组织形式税基移动倾向，然而，既有研究对这种税基转移的形式以及引发的经济结果关注还不足。本文利用2018年我国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下降的政策冲击，通过工商注册数据中新进入企业的组织形式特征及变化，讨论税收成本引致的税基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间的转移情况。结果发现：（1）以税基转移为目的成立的非法人企业市场进入率平均增加5.57%，其中个人独资企业是税基转移更主要的目标类型。（2）这种跨组织形式的避税行为在商贸服务业、高薪行业和外包性强的行业，以及中小微企业中更为普遍。（3）匹配税收调查数据后进一步分析发现，有税基转移“通道”的法人企业在个税改革后利润减少8.26%，企业所得税减少16.97%。跨组织形式的税基转移导致部分政策红利“漏出”问题应当予以关注，坚持减税政策的同时应考虑税种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加强税制间的协调与衔接。

**关键词：**税收成本 税基转移 企业组织形式 税制失衡

**一、引言**

建立均衡协调的现代税收体系是构建现代税收制度的核心。税收体系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税种之间存在着协同作用和互动效应[[1]](#footnote-1)。既有研究从税收的收入结构和来源结构（高培勇，2023）、增值税生产地征收原则下的税源和税负的背离（吕冰洋等，2020；刘怡等，2022）以及区域间税负差异（谷彦芳，2022）等视角讨论了税制失衡所带来的问题。然而，较少有研究关注税种间的非均衡问题。差别化的税收政策是产生税制失衡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同一纳税对象，不同课税模式下企业面临的税收成本不同，会影响企业组织形式的抉择（Scholes & Wolfson，1992）。这种由税制失衡引发的跨组织形式避税行为，不仅会干扰企业的经营决策，扭曲市场资源配置，还造成税基在不同税种间进行转移，影响减税改革成效。

很多国家对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实施不同的所得税课税模式，对纳税能力低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以提高其生存空间和经营绩效。我国不同组织形式企业也是实施差异化的所得税课税模式[[2]](#footnote-2)，法人企业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需先按比例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分配所得时个人投资者再按比例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属于“双重课税”；而对于非法人企业，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个体户等，其经营所得只需要按超额累进税率缴纳一次个人所得税。

虽然差别化的税收政策具有即时性、便利性和导向性的优点，是许多国家用于激励企业成立的政策工具，但客观上也造成两类企业实际税率不同，为企业避税提供了选择空间。现有研究多是关注跨国公司或者集团企业的区域间税基转移活动（Bilicka，2019；Langenmayr & Liu，2023；冯晨等，2023a，2023b），然而对于普通企业，通过成立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将税基转移到税负更低的企业，是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减少纳税义务的方式。因此，越来越多现代服务、咨询、设计、直播带货、影视等通过数字经济和互联网平台发展起来的企业，通过成立个人独资企业（如个人工作室）、合伙企业进行避税。这种跨企业组织形式的税基转移带来了巨额的政策成本，国外学者估算英国在13年间的税基转移造成税收净流失高达14.3亿英镑（Tazhitdinova，2020），巴基斯坦的税基转移使提高税率的改革成本增加了40%（Waseem，2018）。然而由于新成立企业的真实动机难以通过资金流、财务信息捕捉，这种跨组织形式进行税基转移的探讨大都出现在税收筹划的案例研究中，目前仍然缺乏税基转移动机下企业进入的系统性经验证据。这使得政策部门难以根据企业组织形式变化的真实动机和税基转移程度优化税制。

本文基于我国企业工商注册的全量数据，通过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再次成立新企业的组织形式变化刻画税基转移驱动的企业进入：由于非法人企业税率水平低于法人企业，若这类企业主新设立的是非法人企业，则该企业可能会成为法人企业进行税基转移的“通道”；与之相对应，若新设立的企业为法人企业，则理论上不存在通过成立新企业进行跨组织形式转移税基的可能。因此，实证设计中将前者视为处理组（“税基转移型”），后者视为对照组（“非税基转移型”）。在2018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下降进一步扩大了两类企业税率差异的背景下，跨组织形式的避税激励增加，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方法，比较了处理组和对照组两类企业在2018年政策前后进入率差异，从而剔除非税因素干扰，并将着重讨论三个问题：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在税收成本上的差异是否会导致跨组织形式的税基转移？如果会，具备哪些特征的企业税基转移现象更加严重？税基转移企业的利润和企业所得税如何变化？

实证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减税使“税基转移型”企业的市场进入率平均提升5.57个百分点；个人独资企业是企业主进行税基转移更主要的目标类型。商贸服务业、外包性强的行业、中小微企业以及高薪行业的企业税基转移现象更为普遍。匹配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与企业工商注册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具有税基转移条件的法人企业，即经营了其他独资或合伙企业的企业主，其名下的法人企业相比于其他不具备税基转移条件的法人企业，在改革后利润减少8.26%，应交所得税减少16.97%，由此造成的企业所得税总流失约为987.86亿元，约占2018-2019年企业所得税年均实际收入的2.72%。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贡献如下：一是关注到企业利用不同组织形式进行避税的行为，并系统评估了跨组织税基转移驱动的企业进入效应。跨组织形式避税本质上是不同税种间税基的移动，且由于受益区间的原因，多发生于小企业中，因其数量众多且征管难度大。此前避税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区间税率差异导致的税基转移，如跨国公司利用国家间税率差异和属地原则进行的避税活动（白思达，2019；刘志阔等，2019；Casi et al.，2020），以及地区间税率差异和税收竞争导致税基转移至“税收洼地”（冯晨等，2023a）。这些研究关注的是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在母子公司、关联公司间通过转移定价等方式进行利润转移，且局限在企业所得税（同一税种），而本文关注对象是规模较小企业的跨组织形式的税基转移，并且涉及到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不同税种）。

二是在减税带来的企业进入效应中，区分了税基转移驱动和创业驱动的企业进入。很多研究仅指出企业进入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方面的重要性（Glaeser et al，2015；Haltiwanger et al，2017），以及减税如何影响创业者设立新企业（Gentry，2005；Romanov，2006；Da Rin et al.，2011；DeBacker et al.，2019），但没有区分避税动机和创业激励的企业进入。这两类企业进入不仅在政策意义上有很大的不同，还会给关键经济变量带来测度干扰，影响经济政策的判断与制定（Gordon & Slemrod，1998；Clarke & Kopczuk，2017）。本文在实证上对二者进行了区分。类似于已有文献对比同一纳税人过去和现在申报所得税类型差异捕捉是否存在税基转移动机（Waseem，2018；Smith et al.，2019），本文借鉴Tazhitdinova（2020）文中的做法，追踪同一企业主不同类型企业成立的行为对企业进入动机进行区分，是对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

三是提供企业跨税种进行税基转移的证据，回应了现有税制设计中亟待完善的部分。税收优惠是发展中国家为鼓励创业而广泛采用的政策工具（Evans & Leighton，1989；Lim et al.，2016；贾俊雪，2014），但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适用所得税税率的差异，也为企业主通过成立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进行税基转移提供了机会。这不仅意味着减税政策对创业的激励效应可能被高估，还可能造成政策预期外的税收流失。可见，良好的税收制度设计不仅应该考虑各个税种产生的经济影响，还应当考虑税种之间的协同作用和相互影响。因此，了解我国税制失衡下税基转移是否驱动了企业进入，以及有多少企业因此而设立，对于准确解释经济结果和优化税收政策都至关重要。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就税基转移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第三部分介绍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制度差异、典型事实和研究假说。第四部分介绍数据和识别策略。第五部分展示实证结果。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关注不同税种之间的税基转移现象，考察企业所得税税率与个人所得税税率差异下的企业避税行为。与此相关的文献主要涉及区域间税基转移、个人税基转移以及不同组织形式间的税基转移。

首先，区域间税基转移包括国际间税基侵蚀和一国内不同地区间的税基转移。前者属于不同国别税制下的避税引发的税基转移，代表性文献是税收洼地引发母子公司间的利润转移（白思达，2019；刘志阔等，2019；Dharmapala & Riedel，2013；Bilicka，2019；Clifford，2019；Casi et al.，2020；Langenmayr & Liu，2023）。后者则是不同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引发的税基转移，代表性文献集中在区域间税率差异引致的收入转移（Gupta & Mills，2002；Fajgelbaum et al.，2019；王凤荣和苗妙，2020；马光荣和程小萌，2022；冯晨等，2023a）。区域间税基转移依赖于不同地区之间的税率差异，避税主体集中在跨国企业和集团公司等具有一定体量和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中，鲜少涉及较小规模企业的避税行为。

检验跨区域税基转移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比较集团企业在避税地和非避税地的子公司税前利润，避税地子公司往往有更高的税前利润、更低的实际税负、或持有更低的内部债务比例（Huizinga & Laeven，2008；Clausing，2009；Heckemeyer & Overesch，2017）。二是比较一国内独立企业与拥有国外子公司的企业利润或税负，拥有国外子公司的企业由于具有更加灵活的跨境避税方式通常报告利润或实际税负更低（Egger et al.，2010；Finke，2013；Bilicka，2019；刘志阔等，2019）。三是利用跨国子公司盈利能力冲击识别，高税率地区的正向利润冲击将部分转化为低税率地区子公司的利润增长（Dharmapala & Riedel，2013）。然而，这些文献多是从集约边际角度探究企业在已有关系网中的税基转移行为，忽略了企业还可能通过广延边际（即新建企业）的方式进行税基转移。当然，本文在研究税基转移行为的集约边际时，部分借鉴了跨区域税基转移识别方式。

其次，个人税基转移的研究进展相对较慢，相关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变动引发的个人整体收入以及工作努力的调整，重点在于估算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弹性（Feldstein，1995）。而近些年的研究开始关注个人所得税税率变化引发的收入结构变化。比如Saez et al.（2012）基于1960-2006年美国前0.01%收入群体的收入构成变化发现，收入来源形式与税率变动高度相关，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的降低使大量股息收入向工资性收入转变。除此之外，在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也发现了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相互替代的税基转移行为（Piketty & Saez，2003；Piketty，2003；Piketty & Saez，2006）。这些文献逐渐引起学者们关注个人所得税中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之间的相互转化，初步发现税基转移的端倪。

然而，无论是区域间税基转移还是个人收入结构变化的税基转移，研究对象比较的是同一税种内部如何通过企业注册地选择或者调整个人收入构成降低税收成本，所研究的税基转移都是围绕同一税种的税率差异实现，忽略了利用不同税种的税率差异以及组织形式转化产生的税基转移。在很多国家税收体系中，不同税种的税基存在一定重叠，税种间存在外部效应。例如，企业所得税税率提高时，一部分企业会转化为非正式经济，这不仅导致企业所得税税基减少，增值税税基也会相应变少（Waseem，2018）。遗憾的是，对于不同税种间存在的协同和互动作用以及所引发的税基转移相关研究还较为不足。

最后，与本文联系最为密切的文献是不同组织形式间的税基转移。许多国家对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实施差异化所得税制度，设计初衷是考虑不同类型企业经济特征和税负承担能力。但在转变组织形式成本较低的前提下，企业可以通过灵活调整企业组织形式以适用于更低的税收成本，即税种间税率差异导致税基在不同组织形式间流动。这一可能性已在美国、以色列、挪威、瑞典、印度、巴基斯坦、英国等多个国家发现了支持证据（Goolsbee，1998；Romanov，2006；Thoresen & Alstadsæter，2010；Edmark & Gordon，2013；Sivadasan & Slemrod，2008）。比如，Slemrod（1995）发现美国1986年个人所得税减税后，缴纳个人所得税的S型企业和合伙企业的收入增长了351.4%，相比之下工资薪金仅增长5.4%，以此推测应税收入的增长是由大量C型企业向S型企业转化造成的。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研究都是基于宏观数据的反推，并没有提供税基转移的微观证据。

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跨组织形式税基转移行为的微观识别面临着很大的数据挑战。因为追踪同一收入在不同时间段的实现形式往往比追踪收入的实现地点更加困难，不同组织形式间的税基转移相比于跨地区税基转移更为隐蔽。少数文献利用独特数据在此方面做出了尝试（Waseem，2018；Smith et al.，2019；Tazhitdinova，2020）。其中，Waseem（2018）利用2009年巴基斯坦合伙企业个人所得税税率大幅提高构造外生冲击，通过独资企业纳税人报告收入类型的变化识别组织形式的转化，发现改革后部分合伙企业收入流入税率相对较低的独资企业。Smith et al.（2019）收集了美国2001-2014年C型企业转化为S型企业的数据（在美国C型企业转化为S型企业，只需要备案即可），估计出2001年后S型企业的数量增长约有30%是企业组织形式转化的结果。Tazhitdinova（2020）模拟企业在收入不变时，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额的不同，检验了税率差异对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影响，发现英国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带来的企业进入，约有一半是由避税激励下非法人企业向法人企业的转化造成。然而，这些研究却建立在特殊的制度和数据基础之上。比如，可以通过对比同一纳税人过去和现在申报所得税类型差异捕捉是否存在税基转移动机（Waseem，2018）。但这一方面需要掌握自然人在不同时期的税收申报类型，这种类型的数据很难获取，另一方面这种纳税人身份的直接转化在很多国家制度上就是行不通的。考虑到我国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不能直接转化，先注销旧企业再设立新企业的成本又太高，企业避税时往往是保留旧企业，通过注册新的不同组织类型的企业进行税基转移。鉴于此，本文没有去追溯同一纳税人在不同企业组织形式间的转换，而是借鉴Tazhitdinova（2020）通过企业主是否首次成立企业识别创业动机的做法，使用具备某种特征的非法人企业进入数量的边际增长率甄别税基转移动机，突破了已有文献对纳税人个人所得税申报数据和企业税务管理制度的依赖。这为研究税基转移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三、制度背景、典型事实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与典型事实**

税收横向公平原则要求具有相同纳税能力的人承担相近的税负，然而组织形式间的税负差异却给企业避税预留了较大空间。如引言所述，中国采用的是古典所得税制度，即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适用于不同的所得税征税模式和税率。对法人企业的所得实行双重征税模式，即企业经营所得形成时，按比例税率25%征收企业所得税，当所得以利息、股息、红利等形式分配给股东时，按20%的比例缴纳个人所得税[[3]](#footnote-3)。对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非法人企业，其经营所得按照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4]](#footnote-4)。所得税政策引起的税收成本差异为企业主通过组织形式进行避税提供了基础，企业主将会趋向于选择平均税率更低的组织形式。

为了更为直观地说明所得税制不同带来的税负差异，表1中列举了一个案例。假设某人2017年企业税前所得为40万元，税后所得全部分配，其组建企业有两种方案：一是成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即法人企业；二是成立个人独资企业，即非法人企业。根据2017年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若成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应缴纳的所得税实际税率比成立个人独资企业高10个百分点（如表1的第1、3列所示）。也就是说，目前的税制设计在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税基转移激励。

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进一步拉大了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之间的税负差异。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对《个人所得税法》修改的决定，对经营所得税率表进行了调整，降低了1.5至50万元之间应纳税所得额的边际税率，边际税率变动具体情况如表A2所示[[5]](#footnote-5)。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生产经营所得税率表于2018年10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同一时期，企业所得税和利息、股息、红利的个人所得税没有发生变化，仍按25%和20%的比例税率征收。在改革后，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税率，税前所得为40万元的个人独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大幅降低（如表1第4列所示），约占法人企业实际税率水平的二分之一。考虑到国家给予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本文还以2018年同等规模小微企业为例计算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税负[[6]](#footnote-6)，如表1第2列所示，可以看出，2018年个税减税后非法人企业的税负依然低于小微企业[[7]](#footnote-7)。如果同时考虑一些非法人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小微企业与非法人企业的税负差异还可能更大一些，税基转移动机可能会更强一些[[8]](#footnote-8)。

**表1 组织形式选择方案与所得税名义税率**

|  |  |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4) |
| 组织形式 | 法人企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小微企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非法人企业（个人独资企业） | 非法人企业（个人独资企业） |
| 时间 |  | 2018年 | 2018年个税改革前 | 2018年个税改革后 |
| 经营利润 | 400000元 | 400000元 | 400000元 | 400000元 |
| 企业所得税 | 100000元 | 40000元 | 0元 | 0元 |
| 税后利润（分配股利） | 300000元 | 360000元 | 400000元 | 400000元 |
| 个人所得税 | 60000元 | 72000元 | 125250元 | 79500元 |
| 所得税总额 | 160000元 | 112000元 | 125250元 | 79500元 |
| 所得税实际税率 | 40% | 28% | 31.31% | 19.88% |

注：根据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前后《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计算所得。

进一步，本文计算了改革前后法人和非法人企业的平均税率。图1A显示了两类企业平均税率随应纳税所得额的变动情况，其中法人企业所得税的平均税率为40%[[9]](#footnote-9)，非法人企业平均税率在5%-35%之间，且改革前平均税率高于改革后。两种类型企业的所得税平均税率之差如图1B所示，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低拉大了两类企业的平均税率差距，且在应纳税所得额较小的企业中，税率差异的扩大更为明显。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减税改革很可能增强了企业通过组织形式进行税基转移的动机，为后续税基转移的识别提供了外生的政策冲击。

 

图1 不同企业的平均税率差异

注：笔者根据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计算的平均税率绘制。其中，法人企业所得税平均税率为25%+(1-25%)×20%=40%，非法人企业所得税平均税率为应纳税所得额的分段函数。

如前所述，2018年个人所得税扩大了相同所得的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适用的平均税率差距，从而可能引致法人所有者创建独资、合伙企业等来实现收入转移的避税激励（Gordon & Slemrod，1998），这对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工商注册数据，本文统计了2015-2021年间法人与非法人企业的进入率。考虑到建账规范性与税务机关征管方式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10]](#footnote-10)，以及不同类型企业经营实力的可比性，本文统计的法人企业只包括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非法人企业只包括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

企业进入率的计算借鉴了毛其淋和盛斌（2013）的研究，将企业在工商数据中第一次出现的注册日期视为企业成立日期，将登记状态不属于“存续”、“成立”和“正常”的企业判定为退出状态，以退出状态企业的核准日期作为企业退出时间，以每一年分省分类型的企业新注册数量，除以上一年该省该类型的企业存量[[11]](#footnote-11)，得到省份-类型层面的企业进入率。

两种组织形式企业进入率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近年来非法人企业增长迅速。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2018年之前两类企业进入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非法人企业进入率低于法人企业。2018年后，法人企业进入率继续下降，由2017年43.49%下降至2021年25.24%；而非法人企业进入率呈现增长趋势，由2017年的18.69%增长至2021年的26.23%。



图2 分类型企业进入率

注：（1）进入率为当年各省企业进入率的均值；（2）数据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为探究非法人企业进入率迅速增加的成因，本文进一步区分了注册有不同组织形式企业的企业主。首先，用logit模型估计了两类企业主在个人所得税改革后成立非法人企业的概率[[12]](#footnote-12)，结果如图3所示。其中改革前注册过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在改革后再成立非法人的概率为4.54%，而改革前不曾注册过法人企业的概率为4.12%，前者高于后者。意味着注册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在改革后成立非法人的概率增高。进一步将非法人企业分解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时，这一结论保持不变。



图3 企业主在个税改革后成立非法人企业的概率

注：图3描绘了改革前成立法人企业的边际效应。

此外，统计不同企业主注册的企业数量发现，经营法人企业的企业主注册企业的平均数量相对更多。图4是不同企业主注册企业的数量分布。其中，经营过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平均拥有1.6个企业，没有经营过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平均拥有1.2个企业。二者相比，经营法人企业的企业主比没有经营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平均拥有更多企业。



图4 企业主持有企业个数分布

注：根据工商注册数据统计绘制。

自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以来，非法人企业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相关文献将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分解为真实的商业活动和避税动机下的税基转移（Tazhitdinova，2020），其中，避税激励下的非法人企业进入将会使税基由高税率向低税率税种流动，造成税收政策的无谓损失。若忽略了避税激励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可能会夸大税收的创业激励效应，因此本文实证研究的重点在于对企业成立动机做出进一步的细分，以区分税基转移驱动下的企业设立。

**（二）研究假说**

减税是政府调动市场活力的常用手段。现有文献关于减税对企业进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创业的激励作用。Sedlacek & Sterk（2019）、田磊和陆雪琴（2021）将税收因素引入异质性企业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减税降费政策增加了创业的价值，能够在长期吸引企业进入市场进而激发市场活力。一方面，减税政策减少了创业的机会成本，提高创业预期回报，从而提升企业主承担风险的能力，增强其创业动机（Evans & Leighton，1989），另一方面，减税降费所营造的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了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吸引更多投资者和创业者参与创新创业，形成更加活跃的创业生态圈（Lim et al.，2016）。然而，这些研究忽视了减税的税基转移效应对企业进入的影响。Tazhitdinova（2020）刻画了创业激励下的企业进入，并将减税对法人企业进入率的影响进行了区分，发现只有一半的企业增长代表真正的创业激励。原因是减税导致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适用税率不同时，改变企业组织形式以适用更低的税率是企业避税的一种可行手段（Waseem，2018；Smith，2019），特定组织形式企业的增长可能仅代表了税基转移的结果。但在中国，企业组织形式不能直接转化，先注销再注册为另一个企业组织形式成本较高、时间较长，相比之下企业主更可能采用成本更低的注册新企业的方式实现税基转移。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低，会增加转移税基型的企业进入。

许多减税激励的文献表明，企业异质性特征将会对减税的企业进入激励产生显著影响。行业的异质性特征是造成激励效果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Romanov（2006）发现税率差异致使个人注册公司将劳动收入转化为资本收入的行为主要发生在商业、医疗服务行业，原因是这些行业从业人员收入较高，税基转移动机强。此外企业规模也是影响减税效果的重要因素。大量文献证据表明在税收激励下跨国公司、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存在税基转移行为（Bilicka，2019；冯晨等，2023；马光荣和程小萌，2022），然而小微企业受税收刺激并没有产生明显的企业进入（赵颖，2022）。在中国小微企业享受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其实际税负水平较低，不同组织形式间的实际税率差异并不大，相比之下中小型企业受到的税收激励更强，利用组织形式转移税基的可能性更大。以上分析表明，高利润行业、提供产品灵活性较强的服务性行业具有更大的转移收益和更低的转移成本，中小企业所得对应的税率差异更大，在这些企业中利用组织形式转移税基的行为可能更加严重。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高利润、服务性行业和中小型法人企业，通过新建非法人进行税基转移的动机更强。

捕捉税基转移潜在影响是相关文献的研究重点。由于避税行为往往具有一定隐蔽性，不易被观察，因此国际避税与税基转移的文献常通过捕捉利润、投资、税收的变化识别税基转移。如Bilicka（2019）利用英国本土企业和在英国经营的外国跨国子公司的应纳税所得差异识别税基转移，发现有转移通道的外国跨国子公司报告的应税所得是英国本土企业的一半。Waseem（2018）同样发现合伙企业税率大幅增长后，其报告的应税所得额显著降低，由此造成的合伙企业增税改革成本增加了40%。Tazhitdinova（2020）发现英国企业所得税下降导致了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税基转移。当个人所得税减税后，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的税率差异进一步增大，存在税基转移动机的企业可能会利用现存的企业关系网将利润和所得税进行转移，造成法人企业自身利润和所得税流失的结果。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低，导致具有避税动机的企业的利润和所得税减少。

**四、数据、识别策略和描述统计**

**（一）数据与识别策略**

本文构建企业进入和税基转移指标的数据主要来自于2015-2021年工商注册数据。与其他调查数据相比，该数据是行政数据，收录了全部注册企业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企业类型、成立日期、所属省市等信息，不仅可以对企业进入动态变化提供详细完整的信息，还能对企业进入前同一企业主的企业注册情况进行追踪。工商注册数据能够精确识别出每家企业进入时点，适合研究创业和企业进入（莫怡青和李立行，2022；谢绚丽等，2018；封进和李雨婷，2023）。本文在进一步提供税基转移的利润和所得税证据时，还使用了2016-2019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其他地区性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经济信息网、国家统计局和各省统计年鉴。

税基转移的识别方式需要考虑我国组织形式的转变规则。在美国，企业可以在适用双重征税模式的C型企业（类似于我国法人企业）和适用个人所得税的S型企业（类似我国非法人企业）之间直接转换纳税身份。而在我国，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不能直接转化，先注销旧企业再设立新企业的成本又太高[[13]](#footnote-13)，企业避税时往往是保留旧企业，通过注册新的不同组织形式企业进行税基转移[[14]](#footnote-14)。因此，本文没有去追溯组织形式的相互转换，而是使用具备某种特征的非法人企业进入数量的边际增长率来识别税基转移。

首先，本文定义了“税基转移型”和“非税基转移型”两类企业。由于非法人企业具备更低的税收成本，很可能成为法人企业税基转移的“通道”。据此，考虑已经拥有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再次设立企业的情形，若新设立企业为非法人企业，将其作为处理组，定义为“税基转移型（*Shifter*）”企业；若新企业为法人企业，将其作为对照组，定义为“非税基转移型（*Nonshifter*）”企业。在省级层面对进入数量进行加总[[15]](#footnote-15)，分别计算两种类型企业的进入率。

其次，当非法人企业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下降进一步拉大两类企业实际税率差距时，企业主利用不同组织形式进行税基转移的动机增强，表现为已经成立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再次注册非法人企业的现象显著增加。基于此，本文借助2018年生产经营所得税率下降的政策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个税改革扩大了两种类型企业的税收成本差距，企业主存在更强的动机成立“税基转移型”企业，通过检验改革是否使“税基转移型”企业进入率增长更多，识别税收成本驱动下的税基转移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仅比较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在改革前后进入率差异并不能准确识别企业的避税行为，这是由于个税减税冲击导致的非法人企业进入既包含了减税的创业激励又包含了税基转移激励。区分两种进入动机的关键在于对新企业成立施加前置条件，借鉴Tazhitdinova（2020）的思路，本文根据成立非法人企业前，企业主名下是否还有法人企业，区分该非法人企业的成立动机，如表2所示：如果非法人企业成立时其企业主从未经营过法人企业（A情形），则不存在跨组织形式的税基转移的可能，将此类企业视为创业激励而进入；反之，如果非法人企业成立时其企业主经营过法人企业（B情形），此非法人企业就具有法人企业税基转移的“通道”作用，则将该类非法人企业视为避税激励而进入，也即实证中的处理组样本。考虑到经营过法人企业的企业主与没有经营过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因此，与处理组的限制条件保持一致，我们将对照组限定在有法人企业的企业主成立的新企业中（C情形）。限于篇幅原因，有关减税创业激励效应和税基转移效应对比的实证结果放在了附录中。

**表2 新企业进入动机的区分**

|  |  |  |  |
| --- | --- | --- | --- |
| 情形 | 企业主成立新企业前 | 新企业 | 新企业类型（进入动机） |
| A | 没有成立过法人企业 | 非法人企业 | 创业激励型（无转移通道） |
| B | 成立过法人企业 | 非法人企业 | 税基转移型（有转移通道）处理组 |
| C | 成立过法人企业 | 法人企业 | 对照组 |

本文利用企业工商注册数据分别计算各省每年两种类型企业的进入率。具体如下：首先，构建同一企业主不同时间成立的企业记录，并根据当年新增企业和已有企业的类型判断该企业是否属于“税基转移型”企业。其次，汇总每年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数量。企业进入率等于某类型的企业当年新增数量与同一组织形式的企业存量之比，其中企业存量等于企业累计进入数量与累计退出数量之差。考虑到直辖市通常有更高的政策自主权，样本中未包括直辖市数据。

图5展示了2015-2021年间*Shifter*和*Nonshifter*进入率的变化情况。在2018年以前，*Shifter*进入率约为7%，*Nonshifter*进入率约为15%，前者始终低于后者，且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而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经营所得税率下降后，*Shifter*进入率出现转折，开始呈现上升趋势，*Nonshifter*进入率继续下降，二者差距逐渐缩小，2021年进入率均接近10%。与税收政策变化一致，2020年税基转移型企业发生了跳跃式增长，其原因是海南省2020年出台了“两个15%”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个人所得税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使大量非法人企业进入市场。附录图A1提供了剔除海南省样本后企业进入率变化趋势。



图5 “税基转移型”与“非税基转移型”企业进入率

本文的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省类型企业在年的企业进入率。是识别税基转移的分组变量，“税基转移型”企业取1，“非税基转移型”企业取0。个人所得税改革发生的虚拟变量，2018年之前赋值0，2018年及以后赋值1。借鉴贾俊雪（2014）的研究构建随时间变化的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X\_{pt}$，控制公路密度与金融发展指数以捕捉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控制人口密度和就业人口占比以捕捉市场规模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控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以捕捉产业结构的影响。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计算方式如表3所示。、、分别表示省份、企业类型、年份固定效应，为误差项，标准误聚类在“省×企业类型”层面。

**表3 控制变量的说明**

|  |  |  |
| --- | --- | --- |
| 变量名称 | 符号 | 含义或计算方法 |
| 公路密度 |  | 公路里程/行政区域面积 |
| 金融发展指数 |  |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 |
| 人口密度 |  | log（常住人口/行政区域面积） |
| 就业人口占比 |  | 城镇就业人口数/常住人口数 |
| 第二产业占比 |  | 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
| 第三产业占比 |  |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

**（二）描述性统计**

表4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2015-2021年内，新注册法人和非法人企业共约2079.67万家，*Shifter*和*Nonshifter*占全部新注册企业的37.21%，其中*Shifter*比重约13.54%。而在新注册的*Shifter*中，个人独资企业有89.98万家，合伙企业有14.84万家。从表中可知，*Shifter*进入率为6.29%，*Nonshifter*进入率为13.33%，后者高于前者。2015年，*Shifter*企业约有10.71万家。2021年，这一数量达到约28.27万家。

**表4 描述性统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名称 | 观测值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企业进入率（*Shifter*=1） | 189 | 0.0629 | 0.0421 | 0.0121 | 0.2488 |
| 企业进入率（*Shifter*=0） | 189 | 0.1333 | 0.0417 | 0.0562 | 0.2488 |
| 企业类型（*Shifter*） | 378 | 0.5000 | 0.5007 | 0.0000 | 1.0000 |
| 金融发展指数 | 378 | 3.4327 | 0.8387 | 2.1320 | 6.3234 |
| 公路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 378 | 0.9090 | 0.5230 | 0.0667 | 2.2048 |
|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 378 | 5.0961 | 1.3925 | 1.0170 | 6.7426 |
| 就业人口占比 | 378 | 0.1146 | 0.0259 | 0.0741 | 0.1810 |
| 第二产业占比 | 378 | 0.3949 | 0.0597 | 0.1926 | 0.4986 |
| 第三产业占比 | 378 | 0.5019 | 0.0366 | 0.4077 | 0.6033 |

注：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以避免极端值的影响。

表5给出了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质量特征描述。从新进入企业登记的参保人数来看，处理组在0人的聚集更为明显，超过92%的处理组参保人数为0，对照组仅有81%左右的企业参保人数为0。从存活时间来看，处理组平均存活时间更短，约14.69%的处理组存活时间不到两年，而对照组这类企业的比例相对较低，仅占7.86%。从新注册资本来看，处理组注册资本更低。超过60%的处理组注册资本在50万元以下，而对照组中超过70%的企业注册资本超过了50万元，总体上对照组规模大于处理组。

**表5 新进入企业质量特征对比**

|  |  |  |
| --- | --- | --- |
|  | 处理组（*Shifter*=1） | 对照组（*Shifter*=0） |
| 参保人数（人） |  |  |
| 0 | 92.18% | 81.31% |
| 1-10 | 7.44% | 16.61% |
| >10 | 0.38% | 2.09% |
| 存活时间（年） |  |  |
| <=1 | 9.07% | 3.66% |
| <=2 | 5.62% | 4.20% |
| >2 | 85.32% | 92.15% |
| 注册资本（万元） |  |  |
| <=10 | 44.70% | 11.08% |
| <=50 | 20.89% | 17.50% |
| >50 | 34.41% | 71.42% |

**五、实证结果**

跨组织形式税基转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受到避税激励新成立非法人企业，本文将此现象视为税基转移的广延边际；另一方面企业主在已经建成的企业关系网中，将法人企业的利润和所得税转移到非法人企业，由于后者发生于在位企业之间，本文将此现象视为税基转移的集约边际。实证部分重点分析了跨组织形式避税的新建企业行为，并进一步提供了法人企业利润和所得税转移的集约边际证据，作为对税基转移广延边际的补充。

**（一）广延边际**

**1. 基准回归结果**

表6第（1）列显示了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回归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改革使“税基转移型”企业（*Shifter*）的市场进入率显著增加，增长幅度约为5.57个百分点。根据改革前样本总数计算，这一增长幅度这意味着改革后平均每年有65513家[[16]](#footnote-16)“税基转移型”非法人企业成立。

尽管理论上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都可以作为税基转移的目标企业，但二者注册成本和运营方式的差异使得我们能从转移成本的角度作出进一步分析。相比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成立和运营的成本更高：成立合伙企业必须有两个以上合伙人，制定并遵循书面合伙协议；而个人独资企业则在注册和经营上拥有更大的自主决定权，更可能成为税基转移的首选方案。表6第（2）、（3）列分别显示了以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作为“税基转移型”企业的回归系数。与预期相一致，个人独资企业的进入率提高约5.8个百分点，增长幅度高于基准回归结果，而合伙企业进入率提高约4.82个百分点，两者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印证了，虽然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都是税基转移的目标，但由于独资企业转移成本更为低廉，企业主更多通过设立个人独资企业来实现转移税基。

**表6 税基转移的检验**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 非法人企业（全样本） | 独资企业（转移成本低） | 合伙企业（转移成本高） |
| *Shifter×Post* | 0.0557\*\*\*(0.0092) | 0.0580\*\*\*(0.0101) | 0.0482\*\*\*(0.0089) |
| 控制变量 | √ | √ | √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 | √ |
| 省份固定效应 | √ | √ | √ |
| 企业类型固定效应 | √ | √ | √ |
| 观测值 | 378 | 378 | 378 |
| R2 | 0.6850 | 0.6570 | 0.6416 |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是聚类标准误，聚类在省份×企业类型层面。

为了更好观测个人所得税改革对税基转移型企业影响的动态效应，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对改革的影响进行了分解，具体的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表示第$t$年距离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时间是否为年的哑变量。样本期间为2015-202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为2018年，取值范围为-3到3期。本文选取改革的前一年2017年（期）作为基期。

图6给出了改革对税基转移企业的动态影响结果。可以看到在改革前*Shifter*和*NonShifter*进入率没有显著差别，满足平行趋势假定。而在改革后*Shifter*进入率显著增长，且随着时间推移，改革效应逐渐显现。当聚焦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时，结论没有发生改变。



图6 税基转移企业进入率的动态变化趋势

**2. 稳健性检验**

上述分析中的实证检验存在不尽完善之处。一是识别策略可能将部分正常业务扩张的企业进入纳入税基转移型企业，二是存在其他竞争性假说，其他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或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的系统性差异，也可能造成两类企业进入率发生变化，三是被解释变量还可能受到其他随机性因素的影响。为此本文作出三组稳健性检验。

第一组检验是关于“税基转移型”企业的分类定义。一是把新注册企业限定在同行业或者同地区。企业生产活动或者利润一般更可能是同地区或者同行业之间的转移，本文分别以新注册企业是否与同一企业主之前经营的法人企业属于同县、同城市同行业、同县同行业作为标准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在4个标准下回归结果都显著为正。

**表7 不同标准下的税基转移**

|  |  |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4) |
| 同市 | 同市同行业 | 同县 | 同县同行业 |
| *Shifter×Post* | 0.0557\*\*\*(0.0092) | 0.0202\*\*\*(0.0035) | 0.0310\*\*\*(0.0044) | 0.0086\*\*\*(0.0015) |
| 控制变量 | √ | √ | √ | √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 | √ | √ |
| 省份固定效应 | √ | √ | √ | √ |
| 企业类型固定效应 | √ | √ | √ | √ |
| 观测值 | 378 | 378 | 378 | 378 |
| R2 | 0.6850 | 0.6804 | 0.7372 | 0.7106 |

注：标准1-4分别表示新注册企业与企业主以前成立的某法人企业属于同市、同市同行业、同县、同县且同行业。\*\*\*、\*\*、\*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是聚类标准误，聚类在省份×企业类型层面。

二是限定新企业成立时间范围。前述定义下“税基转移型”企业没有限定法人企业的存续，样本包括了企业主注销法人企业之后再成立的非法人企业，若新设立的非法人企业存在税基转移动机，则其成立新企业与注销旧企业时间应当较为接近。对于成立时间与法人企业注销时间间隔较为久远的非法人企业，其设立往往是出于真实的生产经营考虑而非税基转移动机。因此，本文对新注册企业成立时间与企业主已有法人企业注销时间进行了限制，即新企业注册成立时，法人企业仍然存续，或法人企业注销不足半年或一年。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在限定新企业成立时间范围后，仍然发现了税基转移现象。

**表8 限定注销企业与成立企业间隔时间**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 法人企业存续期间成立新企业 | 法人企业存续或退出不满半年内成立新企业 | 法人企业存续或退出不满一年内成立新企业 |
| *Shifter×Post* | 0.0504\*\*\*(0.0081) | 0.0507\*\*\*(0.0082) | 0.0510\*\*\*(0.0084) |
| 控制变量 | √ | √ | √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 | √ |
| 省份固定效应 | √ | √ | √ |
| 企业类型固定效应 | √ | √ | √ |
| 观测值 | 378 | 378 | 378 |
| R2 | 0.6864 | 0.6866 | 0.6861 |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是聚类标准误，聚类在省份×企业类型层面。

第二组检验考察其他同期政策可能的干扰和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的系统性差异。首先，考虑普惠金融的影响。我国普惠金融事业发展迅猛，重点支持小微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这使得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有了更多发展机会。为了排除普惠金融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在回归结果中控制了各省每年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指标采用的是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构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回归结果如表9第（1）列所示，回归结果显著为正。

其次，考虑数字经济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小微商家创业提供了有力支撑，“低门槛、低成本、快部署”的特点使中小企业、个体户等更为活跃。特别是平台经济促进了市场的细分化与个体化，催生了更多新形式的创业（莫怡青和李立行，2022）。国家统计局在2021年发布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为界定数字经济的范围提供了参考标准，将数字经济划分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其中前四种是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本文根据这一分类，将包含前四类产业的行业剔除进行回归，表9第（2）列显示了回归结果，在剔除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后，“税基转移型”企业进入率依然增加。

第三，考虑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2020年起，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的发展，两地均出台了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17]](#footnote-17)，经营所得减按15%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使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面临更大的税率差异，税基转移激励更强，这意味着非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的企业转移激励稍弱。表9列（3）、（4）分别显示了剔除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地区样本的估计结果，结果仍然显著为正，且均弱于基准回归，与预期结果一致。

第四，考虑新冠疫情对企业进入的影响。2020年以后新冠疫情使企业线下注册登记较为困难，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出台了鼓励“实行全程网办”的工作文件[[18]](#footnote-18)，各地区企业登记注册业务实现了全程网上办理，从而缩小了疫情导致的不同形式企业注册登记的制度成本差异，这可能会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为此我们剔除了2020年及之后的样本，只估计了疫情前的政策效果，结果如表9列（5）所示，排除疫情影响后，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第五，法人与非法人在投资合伙企业时所履行的纳税义务存在差异，这可能会影响新建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合伙企业遵循“先分后税”的原则缴纳所得税[[19]](#footnote-19)，即对于合伙人是法人企业的合伙企业，利润分配后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而非个人所得税，此时法人企业税负与合伙企业税负一致，不会产生税基转移动机。针对合伙人纳税义务差异的影响，我们识别了合伙企业中合伙人的身份，剔除了合伙人中包含“公司”字眼的样本，回归结果如表9第6列所示。结果仍然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相似。

**表9 排除其他竞争性假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 控制普惠金融指数 | 剔除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 剔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 剔除海南省 | 剔除疫情年份 | 剔除合伙人为公司的合伙企业 |
| *Shifter×Post* | 0.0557\*\*\*(0.0092) | 0.0406\*\*\*(0.0084) | 0.0491\*\*\*(0.0084) | 0.0539\*\*\*(0.0086) | 0.0312\*\*\*(0.0072) | 0.0751\*\*\*(0.0238) |
| 控制变量 | √ | √ | √ | √ | √ | √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 | √ | √ | √ | √ |
| 省份固定效应 | √ | √ | √ | √ | √ | √ |
| 企业类型固定效应 | √ | √ | √ | √ | √ | √ |
| 观测值 | 378 | 378 | 378 | 364 | 270 | 378 |
| R2 | 0.6841 | 0.7077 | 0.7130 | 0.7234 | 0.8127 | 0.1048 |

注： \*\*\*、\*\*、\*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是聚类标准误，列聚类在省份×企业类型层面。

最后，考虑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针对某些行业或地区出台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使部分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的名义税率差异缩小，从而减弱了企业税基转移的激励。例如：（1）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根据税法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0]](#footnote-20)；（2）民族区域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可以决定减征或者免征；（3）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对于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1]](#footnote-21)。为了缓解这一担忧，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排他性检验：一是从天眼查网站收集所有高新技术企业名单，在实证分析中将其剔除，得到的结果如表10列1所示；二是剔除了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结果如表10列2所示；三是剔除了西部地区样本，得到的结果如表10列3列所示。相比于基准结果，剔除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覆盖样本后，结论没有发生改变。且税基转移系数比基准结果略高，表明没有享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样本税基转移程度更高，与预期结果一致。

**表10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排他性检验**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 剔除高新技术企业 | 剔除民族区域自治地区 | 剔除西部地区 |
| *Shifter×Post* | 0.0558\*\*\*(0.0092) | 0.0630\*\*\*(0.0103) | 0.0642\*\*\*(0.0096) |
| 控制变量 | √ | √ | √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 | √ |
| 省份固定效应 | √ | √ | √ |
| 企业类型固定效应 | √ | √ | √ |
| 观测值 | 378 | 308 | 224 |
| R2 | 0.6900 | 0.6704 | 0.6858 |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是聚类标准误，聚类在省份×企业类型层面。

第三组检验即随机构造处理组的安慰剂检验。本文借鉴Li（2016）的研究，假定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企业进入的冲击是随机的，即从样本中随机抽取某省-类型企业作为处理组，剩余样本作为对照组，代入基准回归进行检验。重复上述随机过程500次，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政策效应不再显著。图7为随机处理500次后交互项系数的分布，结果集中分布在0附近，且远小于估计真实值0.0557，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论并不是偶然的随机性结果。



图7 安慰剂检验-虚构处理组

注：图7显示了安慰剂检验的结果，横轴表示回归系数，左边纵轴表示P值，右边纵轴表示核密度，圆点表示每次随机抽样的回归结果。

以上检验结果和基准回归结论保持一致，表明税收成本驱动了不同组织形式间的税基转移，证实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3. 异质性分析**

前文证实了税制失衡下企业可以通过组织形式进行税基转移，那么哪些行业或者企业更有可能驱动企业进行税基转移？基于A-S理论模型，纳税人行为取决于税率与惩罚程度，也就是说企业在转移收益和转移成本之间进行权衡，高转移收益、低转移成本是驱使企业进行税基转移的动机。通过一些异质性分析的检验，可以对此做出进一步推断，以强化文章的论证逻辑。

税基转移现象更可能发生在产品或服务灵活性强、利润率高的行业。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将行业分为19个门类进行分组回归，图8A显示了按行业分组回归的系数结果，不同行业的税基转移效应存在异质性，其中有三类行业呈现出明显的税基转移现象。一是商贸服务业，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这类行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非标准性，产品价值难以比较，开票规范程度低，为利润转移提供了更多机会；二是利润水平较高的行业，如信息传输、软件和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这些行业工作者普遍收入较高，税基转移的收益较大，经营者具有更强的动机进行利润转移；三是外包性较强的行业，如建筑业、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行业，这些行业内存在大量外包企业，外包、转包服务使产业链延长，降低了转移成本，为利润转移提供了条件。

相比于中小微企业，大企业通过组织形式转移税基所产生的收益占比较低，且转移成本相对较大，进行税基转移的可能性较小。参考谢绚丽等（2018）、莫怡青和李立行（2022）的研究，以注册资本反映企业规模大小将企业分为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四类[[22]](#footnote-22)。分企业规模回归结果如图8B所示，结果表明中、小、微型企业存在显著的税基转移现象，其中，微型企业中“税基转移型”企业的市场进入率增长了约3个百分点，小型企业中增长了7个百分点，中型企业中增长了5个百分点，而大型企业则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税基转移现象。这可能是因为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改变组织形式对其所节省的税收占比较低，对税率变动更加不敏感。



图8 税基转移的异质性

注：图8显示了不同维度的分组回归结果。圆点表示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为5%。

**（二）集约边际**

前文主要是从企业进入的视角对个税改革导致大量“税基转移型”企业进入的基本事实作出刻画，这一部分则从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之间的利润和所得的转移作出集约边际的讨论。一个较为直接的证据是，企业主将法人企业的利润和所得税转移给了自己的非法人企业。目前极少有研究捕捉了企业不同组织形式间税基转移的直接证据，如Waseem（2018）发现了当合伙企业适用的税率增长后，其所有者拥有的独资企业应税收入随之增加[[23]](#footnote-23)，但并未进一步提供所得税变化的微观证据。借鉴Bilicka（2019）和Langenmayr & Liu（2023）识别跨国企业税基转移的方法[[24]](#footnote-24)，本文匹配2016-2019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与工商注册数据，将法人企业经营状况与非法人企业注册情况相结合，观察存在税基转移动机的法人企业的所得税和利润变化，作为对广延边际效果的一个补充。

对于同时拥有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的企业主，税基转移则会导致法人企业的利润和所得税减少。基于此逻辑，本文比较的是有转移通道（企业主成立了非法人企业，*Switcher*）和没有转移通道（企业主没有成立非法人企业，*NonSwitcher*）的法人企业利润和所得税的变化。如果有转移通道的法人企业相对于没有转移通道的法人企业利润和所得税减少，则可说明税基转移在集约边际上同样存在。

构建以下双重差分模型：

 

、表示企业和观测时期，被解释变量包括利润总额和应纳税所得额，进行了取对数和上下1%的缩尾处理。表示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在该企业成立后是否成立了其他非法人企业，如果是取值为1，不是则取值为0，表示是否为2018年及以后，如果是取值为1，如果不是取值为0。表示个体固定效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为误差项。

表11汇报了估计结果。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考虑了组别可能存在的不同时间趋势。第（1）、（2）列显示了以利润总额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3）、（4）列显示了以应交所得税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具有税基转移动机的法人企业，在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低后，利润总额减少8.26%，应交所得税减少16.97%。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避税动机下的税基转移现象，即在税基转出的企业中发现了利润和所得税减少的证据，表明个人所得税减税促使企业所得税向个人所得税转化，造成了企业所得税的流失。

**表11 集约边际：利润和所得税证据**

|  |  |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4) |
| 利润总额 | 利润总额 | 应交所得税 | 应交所得税 |
| *Switcher×Post* | -0.0494\*\*\*(0.0177) | -0.0826\*\*\*(0.0256) | -0.1546\*\*\*(0.0387) | -0.1697\*\*\*(0.0518) |
| 企业固定效应 | √ | √ | √ | √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 | √ | √ |
| 组别时间趋势 | × | √ | × | √ |
| 观测值 | 139133 | 139133 | 105837 | 105837 |
| R2 | 0.8671 | 0.8671 | 0.7387 | 0.7387 |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是聚类标准误，聚类在企业层面。

图9展示了处理组和对照组利润水平的变动趋势。一个可能的担忧是个税下降后大量非法人企业的进入形成更激烈的市场竞争造成了企业利润的下降，但从图9来看到无转移通道的法人企业平均利润水平没有发生显著降低，排除了市场竞争假说。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市场集中度变量以缓解市场竞争的干扰，具体结果见附录表A4。



图9 有转移通道和无转移通道法人企业利润变动趋势

此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和法人企业亏损结转同样可能影响税基转移的估计。小微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其实际税率低于名义税率，可能会削弱了法人企业税基转移的动机，本文分别将样本限定在非小型微利企业和小微企业中，得到利润和所得税结果如表12第1至4列所示，当样本限定在非小微企业时，税基转移程度高于全样本平均水平，而小微企业税基转移程度则低于全样本平均水平[[25]](#footnote-25)，印证了上述分析。

法人企业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允许亏损结转，意味着在亏损期间及短期内法人企业面临的税负较低，通过避税手段获取资金的驱动力较弱，利用建立非法人企业转移税基的动机并不强烈。另外，如果法人企业利润为零，税基转移动机也会很弱。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对税基转移估计的影响，我们将税收调查数据中负利润总额或零利润总额的法人企业从样本中删除，只保留法人企业为利润为正的法人企业，对税基转移的集约边际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12第5、6列所示。剔除利润为负和为零的法人企业后，集约边际的税基转移程度更高，表明在没有亏损的情况下，税基转移的程度可能比预期更高。

**表12 稳健性检验：考虑小微企业与亏损结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 非小微企业 | 小微企业 | 利润为正的企业 |
| 利润总额 | 应交所得税 | 利润总额 | 应交所得税 | 利润总额 | 应交所得税 |
| *Switcher×Post* | -0.1074\*\*\*(0.0336) | -0.2126\*\*(0.0924) | -0.0320（0.0389） | -0.1500\*\*\*（0.0474） | -0.0589\*\*(0.0264) | -0.2645\*\*\*(0.0714) |
| 个体 | √ | √ | √ | √ | √ | √ |
| 年份 | √ | √ | √ | √ | √ | √ |
| 组别趋势 | √ | √ | √ | √ | √ | √ |
| 观测值 | 72707 | 49377 | 66426 | 56460 | 104045 | 60249 |
| R2 | 0.8127 | 0.6470 | 0.7177 | 0.6440 | 0.8807 | 0.7069 |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是聚类标准误，聚类在企业层面。

法人企业利润和所得税的减少意味着所得税税基由高税率向低税率流动，造成税收收入额外损失，增加税收改革的成本。根据上述结果可粗略估计税基转移造成的企业所得税流失规模，具体而言，2018-2019年每年转移收入的法人企业*Switcher*数量为378万家，每家企业应交所得税减少16.97%，约为2.61万元，使得每年企业所得税总收入减少了约987.86亿元[[26]](#footnote-26)，约占2018-2019年企业所得税年均实际收入的2.72%[[27]](#footnote-27)。可见，如何减少负外部效应，提高税收政策有效性，是我国未来税收改革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

**六、结论与启示**

税制失衡带来的差异化税收成本会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税收成本较低的企业组织形式成为企业主避税的“通道”，由此引发的税基转移行为将会提高税收改革的成本。一方面，这种隐蔽的税基转移方式有违减税政策的初衷，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府收入的流失，还可能造成部分企业挤占减税政策红利，不利于真正需要纾困解难的小微企业生存发展。另一方面，非法人企业会受到国家信贷规模或者信贷条件的限制，且相对于法人企业，其法律地位相对较低，发展潜力相对受限。在许多欠发达国家，激励企业成立正规的法人企业被视为提高社会总生产力的重要一步。因此，了解企业进入以及税基转移对税收成本差异的行为反应，对于准确评估减税改革成效、促进不同税种间的制度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使用工商注册数据和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利用我国法人与非法人企业税制差异和2018年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税率下降的政策冲击，考察税率变化对具有避税动机的非法人企业进入的影响，并提供了税基转移在利润和所得税方面的证据。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个人所得税减税使以税基转移为目的成立的非法人企业市场进入率提升5.57个百分点，个人独资企业是税基转移的主要目标企业类型；第二，在商贸服务业、高薪行业及外包性强的行业，以及中小微企业中，税基转移现象更加普遍，低转移成本和高转移收益是企业避税的主要驱动因素；第三，个人所得税减税使具备避税条件的法人企业利润减少8.26%，应交所得税减少16.97%，由此造成每年企业所得税的总流失约为987.86亿元。

当前，减税政策是世界各国促进创业、激励创新的重要方式，结构性减税已成为贯穿中国近些年来减税乃至税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在实质性改变税负分布，“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时，需要防范税制失衡带来的税基转移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优化税收制度设计、减少政策红利的“漏出”有如下启示：首先，税制设计应充分考虑横向公平，注重税收制度建设的系统性和协调性。不仅应考虑区域协调、部门协调，还应当考虑不同税种的税率、征税对象、征税范围等税收要素的协调，尽量避免企业在不同税种之间发生“趋利避害”的行为选择。“十四五”乃至今后的一段时间，“低税率、宽税基”原则下的减税降费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制定税收激励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此”税种对“彼”税种税基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性，减少税收改革的无谓损失，提升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成效。挪威中性所得税税收制度的设计为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税制设计既没有对投资和融资决策造成扭曲，又没有产生不同组织形式企业间税基转移的激励（Sørensen，2005）[[28]](#footnote-28)。我国可以借鉴挪威的做法，对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采取相似的税收规则，通过延迟纳税时间使非法人企业与法人企业的税收负担保持平衡。

其次，提高税基在不同组织形式企业间转移的成本。在企业税收成本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受到非税成本的影响（盖地和李彩霞，2012）。一方面，可以对已设立法人企业的企业主新成立非法人企业的行为，采取一定限制性措施，如规范非法人企业的注册流程、加强注册审查和管理、限制同一法人成立非法人企业数量[[29]](#footnote-29)。另一方面，通过提高法人企业的法律地位等措施，引导并激励社会注册正规化的法人企业。

最后，在加强企业税收征管方面，充分考虑行业和企业的异质性。对同时经营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加强税收监控和稽查，重点关注同一区域内同行业间的企业交易，重点稽查服务性强、利润率高和外包程度高的行业，如商贸服务业、科学技术行业、医疗卫生行业。在实现“严征管”的前提下，更好地实现减税政策的目标、提高税收改革的效能。

**参考文献**

白思达，2019：《中国跨国公司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新研究》，《世界经济》第4期。

刘怡、聂海峰、张凌霄、崔小勇，2022：《电子商务增值税地区间分享和清算》，《管理世界》第1期。

封进、李雨婷，2023：《人口老龄化与企业进入：基于中国地级市的研究》，《世界经济》第4期。

冯晨、杨健鹏、池雨乐、赵思琦，2023a：《避税激励与资本弱化后果：企业集团证据》，《世界经济》第10期。

冯晨、周小昶、田彬彬、牛英杰，2023b：《税收稽查体制改革与企业集团资本结构调整》，《经济研究》第8期。

盖地、李彩霞，2012：《税收成本、非税成本与企业组织形式选择——基于经济模型的研究框架》，《当代财经》第4期。

高培勇，2023：《从结构失衡到结构优化——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谷彦芳，2022：《我国地区间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研究》，《税务研究》第4期。

贾俊雪，2014：《税收激励、企业有效平均税率与企业进入》，《经济研究》第7期。

李德洗、张晓波，2017：《商事制度改革效应研究》，《中国市场监管研究》第11期。

刘志阔、陈钊、吴辉航、张瑶，2019：《中国企业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国际税收治理体系重构下的中国经验》，《经济研究》第2期。

吕冰洋、詹静楠、李钊，2020：《中国税收负担：孰轻孰重？》，《经济学动态》第1期。

马光荣、程小萌，2022：《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异地发展与避税》，《世界经济》第12期。

毛其淋、盛斌，2013：《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入退出与生产率动态演化》，《经济研究》第4期。

莫怡青，李力行，2022：《零工经济对创业的影响——以外卖平台的兴起为例》，《管理世界》第2期。

孙浦阳、杨易擎，2023：《个税改革对消费品市场的影响研究——来自2018年个税改革的证据》，《经济研究》第10期。

田磊、陆雪琴，2021：《减税降费、企业进入退出和全要素生产率》，《管理世界》第12期。

王凤荣、苗妙，2015：《税收竞争、区域环境与资本跨区流动——基于企业异地并购视角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

谢绚丽、沈艳、张皓星、郭峰，2018：《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4期。

赵颖，2022：《减税激励与小微企业发展——基于所得税减半征收的证据》，《经济学动态》第5期。

赵颖、鲁元平、王熙、杨国超，2023：《纳税人身份选择与就业机会——来自全国工商与税务匹配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第9期。

Allingham，M. G. ，and A. Sandmo，1972，“Income Tax Evas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3)，323—338.

Bennedsen，M. ，and S. Zeume，2018，“Corporate Tax Havens and Transparency”，*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31(4)，1221—1264.

Bilicka，K. A. ，2019，“Comparing UK Tax Returns of Foreign Multinationals to Matched Domestic Firm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9(8)，2921—2953.

Casi，E. ，C. Spengel，and B. M. B. Stage，2020，“Cross-Border Tax Evasion after the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Game Over?”，*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0，104240.

Clarke，C. ，and W. Kopczuk，2017，“Business Income and Business Tax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950s”，*Tax Policy and the Economy*，31(1)，121—159.

Clausing，K. A. ，2009，“Multinational Firm Tax Avoidance and Tax Policy”，*National Tax Journal*，62(4)，703—725.

Clifford，S. ，2019，“Taxing Multinationals beyond Borders: Financial and Locational Responses to CFC Rul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73，44—71.

Da Rin，M. ，M. Di Giacomo，and A. Sembenelli，2011，“Entrepreneurship，Firm Entry，and the Taxation of Corporate Income: Evidence From Europ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95(9)，1048—1066 .

DeBacker，J. ，B. T. Heim，S. P. Ramnath，and J. M. Ross，2019，“The Impact of State Taxes on Pass-Through Businesses: Evidence from the 2012 Kansas Income Tax Reform”，*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74，53—75 .

Dharmapala，D. ，and N. Riedel，2013，“Earnings Shocks and Tax-Motivated Income-Shifting: Evidence from European Multinational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97，95—107.

Egger，P. ，W. Eggert，and H. Winner，2010，“Saving Taxes through Foreign Plant Ownership”，*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81(1)，99—108.

Edmark，K. ，and R. H. Gordon，2013，“The Choice of Organizational Form by Closely-Held Firms in Sweden: Tax Versus Non-Tax Determinants”，*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2(1)，219—243.

Evans，D.，and L. S. Leighton，1989，“Some Empirical Aspects of Entrepreneurship”，*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9(3)，519—535.

Fajgelbaum，P. D. ，E. Morales，J. C. S. Serrato，and O. Zidar，2019，“State Taxes and Spatial Misallocation”，*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86(1)，333—376.

Feldstein，M. ，1995，“The Effect of Marginal Tax Rates on Taxable Income: A Panel Study of the 1986 Tax Reform Ac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3(3)，551—572.

Finke，K. ，2013，“Tax Avoidance of German Multinationals and Implications for Tax Revenue: Evidence from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pproach”，*Centre for European Economic Research (ZEW)*.

Gentry，W. M. ，and R. G. Hubbard，2005，“Success Taxes，Entrepreneurial Entry，and Innovation”，*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5，87—108.

Glaeser，E. L. ，S. P. Kerr，and W. R. Kerr，2015，“Entrepreneurship and Urban Growth: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with Historical Min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97(2)，498—520.

Goolsbee，A. ，1998，“Taxes，Organizational Form，and the Deadweight Loss of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69(1)，143—152.

Gordon，R. H. ，and J. Slemrod，1998，“Are ‘Real’ Responses to Taxes Simply Income Shifting between Corporate and Personal Tax Bases?”，*NBER Working Paper*，No 6576.

Gupta，S. ，and L. F. Mills，2002，“Corporate Multistate Tax Planning: Benefits of Multiple Jurisdictions”，*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33(1)，117—139.

Haltiwanger，J. ，E. Hurst，J. Miranda，and A. Schoar，2017，Measuring Entrepreneurial Businesses: Current Knowledge and Challenges.

Heckemeyer，J. H. ，and M. Overesch，2017，“Multinational’ Profit Response to Tax Differentials: Effect Size and Shifting Channels”，*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 mique*，50(4)，965—994.

Huizinga，H. ，L. Laeven，and G. Nicodeme，2008，“Capital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Debt Shifting”，*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88(1)，80—118.

Kopczuk，W. ，and E. Zwick，2020，“Business Incomes at the Top”，*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34(4)，27—51.

Langenmayr，D. ，and L. Liu，2023，“Home or Away? Profit Shifting with Territorial Taxation”，*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17，104776.

Li，P. ，Y. Lu，and J. Wang，2016，“Does Flattening Government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23，18—37.

Lim，D. S. K. ，C. H. Oh，and D. De Clercq，2016，“Engagement in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Economies：Interactive Effects of Individual-level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5(4)，933—945.

Piketty，T. ，2003，“Income Inequality in France, 1901–1998”，*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11(5)，1004—1042.

Piketty，T. ，and E. Saez，2003，“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8(1)，1—41.

Piketty，T. ，and E. Saez，2006，“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A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96(2)，200—205.

Piketty，T. ，E. Saez，and S. Stantcheva，2014，“Optimal Taxation of Top Labor Incomes: A Tale of Three Elasticitie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6(1)，230—271.

Romanov，D. ，2006，“The Corporation as a Tax Shelter: Evidence from Recent Israeli Tax Chang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90(10)，1939—1954.

Saez，E. ，J. Slemrod，and S. H. Giertz，2012，“The Elasticity of Taxable Income with Respect to Marginal Tax Rates: A Critical Review”，*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50(1)，3—50.

Sedlacek，P. ，and V. Sterk，2019，“Reviving American Entrepreneurship? Tax Reform and Business Dynamism”，*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05，94—108 .

Scholes，M. ，and M. Wolfson，1992，Taxes and Business Strategy: A Planning Approach，Prentice-Hall，Englewood Cliff.

Sivadasan，J. ，and J. Slemrod，2008，“Tax Law Changes，Income-Shifting and Measured Wag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Indi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92(10)，2199—2224.

Slemrod，J. ，1995，“Income Creation or Income Shifting?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5(2)，175—180.

Smith，M. ，D. Yagan，O. Zidar，and E. Zwick，2019，“Capitalis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34(4)，1675—1745.

Sørensen，P. B. ，2005，“Neutral Taxation of Shareholder Income”，*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12(6)，777—801 .

Tazhitdinova，A. ，2020，“Are Changes of Organizational Form Costly? Income Shifting and Business Entry Responses to Tax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86，104187.

Thoresen，T. O. ，and A. Alstadsæter，2010，“Shifts in Organizational Form under a Dual Income Tax System”，*FinanzArchiv : Public Finance Analysis*，66(4)，384—418.

Waseem，M. ，2018，“Taxes，Informality and Income Shifting: Evidence from a Recent Pakistani Tax Reform”，*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57，41—77.

**附录**

**（一）logit模型估计企业主成立非法人企业概率**

本文使用logit模型估计了个税改革前经营法人企业对改革后成立非法人企业的影响，并估算了经营法人企业对成立非法人企业的边际效应，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是一个二元变量，表示企业主在个人所得税减税后是否成立了非法人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如果是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一个二元虚拟变量，表示企业主在改革前是否经营过法人企业，如果是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为误差项。为减轻创业效应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样本剔除了改革前未成立企业的企业主。

表A1的Panel A汇报了式（A1）回归系数的结果。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营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在改革后再次成立非法人企业的概率显著增加。Panel B汇报了变量的边际效应，列（1）、（2）、（3）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改革后企业主是否成立了非法人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回归结果。例如改革前没有成立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在改革后成立非法人企业的概率为4.124%，而改革前成立了法人的企业主，改革后成立非法人的概率为4.54%。

**表A1 logit模型估计结果和边际效应**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 非法人企业 | 个人独资企业 | 合伙企业 |
| Panel A 回归系数 |  |  |  |
| Treat | 0.1005\*\*\*(0.0036) | 0.1051\*\*\*(0.0039) | 0.3726\*\*\*(0.0092) |
| Panel B 边际效应 |  |  |  |
| P(Y=1|Treat=0) | 4.1236 | 3.5962 | 0.5778 |
| P(Y=1|Treat=1) | 4.5401 | 3.9788 | 0.8365 |
| N | 10087923 | 10087923 | 10087923 |

注：括号里是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二）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税率表**

**表A2 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税率表**

|  |  |  |
| --- | --- | --- |
| 年应纳税所得额 | 2018年改革前 | 2018年改革后 |
| 0-15000元 | 5% | 5% |
| 15000-30000元 | 10% | 5% |
| 30000-60000元 | 20% | 10% |
| 60000-90000元 | 30% | 10% |
| 90000-100000元 | 30% | 20% |
| 100000-300000元 | 35% | 20% |
| 300000-500000元 | 35% | 30% |
| 500000元以上 | 35% | 35% |

注：根据2018年改革前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整理所得。

**（三）剔除海南省的处理组和对照组进入率变化趋势**



图A1 “税基转移型”与“非税基转移型”企业进入率

注：剔除了海南省样本。

**（四）创业效应vs.税基转移效应**

推行减税政策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政策抉择，其政策初衷是让企业“轻装上阵”，激励创业创新。上节已经证实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改革会产生税基转移效应，导致国家企业所得税收入的流失，那么这种因税基转移而进入的企业是否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抵消了减税红利？现有文献表明减税对企业进入的作用包括两方面：税基转移激励和创业激励（Slemrod，1995；Tazhitdinova，2020；赵颖，2022）。有关减税创业激励的研究表明，一方面，减税政策减少了创业的机会成本，提高创业预期回报，从而提升企业主承担风险的能力，增强其创业动机（Evans & Leighton，1989），另一方面，减税降费所营造的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了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吸引更多投资者和创业者参与创新创业，形成更加活跃的创业生态圈（Lim et al.，2016）。因此，减税对企业进入的政策效果评判取决于创业效应与税基转移效应两者的大小。本节利用工商注册数据估计创业效应对企业进入的影响，比较创业效应和税基转移效应的大小，以此说明减税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与政策目标产生了多大的偏差。

同样地，创业效应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税率下降降低了非法人企业经营的税收成本，可能激发商业活动，促进非法人企业进入市场。从未经营过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如果注册成立了非法人企业，那么这类企业的设立更可能是生产经营所得适用税率相对较低所致，故将此类新成立的非法人企业定义为“创业激励型”企业，记为。从未经营过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如果注册成立了法人企业，那么这类企业的设立就与生产经营所得税率适用税率相对较低无关，故将此类新成立的法人企业定义为“非创业激励型”企业，记为。作为前者的对照组模拟反事实企业进入趋势。构建的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取1表示“创业激励型”企业，取0表示“非创业激励型”企业，其他变量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回归系数$β\_{1}$是个税下降对创业的激励效应。如表A3所示第（1）列结果所示，个人所得税减税改革产生的创业效应使非法人企业的进入率提高11.78个百分点，约为税基转移效应的2倍（相对于表6的第1列结果）。总体上来看，个人所得税减税改革产生的创业激励效应大于税基转移效应，这意味着减税政策仍存在有效性。

**表A3 不同标准下的创业效应**

|  |  |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4) |
| 同市 | 同市同行业 | 同县 | 同县同行业 |
| *Start×Post* | 0.1178\*\*\*（0.0258） | 0.1522\*\*\*(0.0314) | 0.1423\*\*\*(0.0304) | 0.1630\*\*\*(0.0330) |
| 控制变量 | √ | √ | √ | √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 | √ | √ |
| 省份固定效应 | √ | √ | √ | √ |
| 企业类型固定效应 | √ | √ | √ | √ |
| 观测值 | 378 | 378 | 378 | 378 |
| R2 | 0.6208 | 0.6392 | 0.6182 | 0.6404 |

注：第1-4列分别表示企业主经营过同市、同市同行业、同县、同县同行业其他法人企业。括号里聚类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2018年个税经营所得改革以减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了非法人企业创业的进入率，对应了我国“宽税基、低税率”的税制改革思路。整体来看，虽然两种所得税税率失衡驱动了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税基转移，但减税带来了创业激励效应大于税基转移效应。

**（五）集约边际：控制市场集中度**

**表A4 集约边际：控制市场集中程度的税基转移**

|  |  |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4) |
| 利润总额 | 利润总额 | 应交所得税 | 应交所得税 |
| *Switcher×Post* | -0.0441\*\*(0.0175) | -0.0696\*\*\*(0.0252) | -0.1499\*\*\*(0.0384) | -0.1580\*\*\*(0.0516) |
| 市场集中度 | √ | √ | √ | √ |
| 企业固定效应 | √ | √ | √ | √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 | √ | √ |
| 组别时间趋势 | × | √ | × | √ |
| 观测值 | 139133 | 139133 | 105837 | 105837 |
| R2 | 0.8700 | 0.8700 | 0.7406 | 0.7406 |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是聚类标准误，聚类在企业类型层面。

1. 例如，企业所得税的税率较高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较低时，企业可能会通过将利润以高额的薪酬形式支付给股东，以规避高企业所得税率，扭曲了税收的公平性和效率性。 [↑](#footnote-ref-1)
2. 《国务院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发〔2000〕16号）规定自2000年1月1日起，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停止征收企业所得税，其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因此在我国现行税制下法人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非法人企业征收个人所得税。 [↑](#footnote-ref-2)
3. 为缓解重复征税问题，我国对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利实行了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持股期限大于1个月小于等于1年的，减半计征，持股期限大于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对占比超过99%的非上市公司分配的股利尚未采取任何免除措施。 [↑](#footnote-ref-3)
4. 1993年10月31日起，中国对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开始征收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以纳税年度收入减除成本、费用和损失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2000年1月1日起，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停止征收企业所得税，其投资者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体工商户征收个人所得税。 [↑](#footnote-ref-4)
5. 自1993年对个体户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经营所得税率表历经2011年和2018年两次调整，表A2的改革前税率为2011年调整后的税率。 [↑](#footnote-ref-5)
6. 根据财税[2018]77号文件规定，2018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当于10%。 [↑](#footnote-ref-6)
7. 样本期间内，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经过多次调整，但经计算小微企业理论税负率一直大于改革后非法人企业税负率。本文还使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计算了2017年（改革前一年）普通法人企业、法人企业中的小微企业和非法人企业的平均实际税负，分别为30.77%、22.1%和14.19%，尽管小微企业实际税率低于普通法人企业，但仍高于非法人企业。 [↑](#footnote-ref-7)
8. 比如现实中很多经营非法人企业的企业主只有生产经营所得，没有其他综合所得，在计算其应纳税所得时，除了可以扣除生产经营中的成本费用外（与法人企业的扣除范围、规则基本相同），还可以扣除基本费用、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及其他法定扣除。以2022年的营业利润40万元为例，应纳税所得额还可以扣除基本减除费用（6万元）、子女教育（每人每年12000元）、赡养老人（每年24000元）。此外，对非法人企业中的个体工商户还有特殊优惠，如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部分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这样实际税负算下来是8.58%。 [↑](#footnote-ref-8)
9. 法人企业先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再缴纳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为25%+(1-25%)×20%=40%。 [↑](#footnote-ref-9)
10. 个体工商户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建立规范的账簿，实际税率与法定税率差异较大，因此文中回归所使用的非法人企业排除了个体户，仅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两种类型。 [↑](#footnote-ref-10)
11. 企业存量用企业累计进入数量减累计退出数量计算得出。 [↑](#footnote-ref-11)
12. 模型设定及回归结果见附录。 [↑](#footnote-ref-12)
13. 根据《关于推进企业注销便利化工作的通知》（国市监注〔2019〕30号）所附的《企业注销指引》，企业注销大致需要经过公示信息、清算、税务清缴、注销登记、社保费清缴等流程。2019年企业注销登记制度改革前，仅通过报纸公示信息一项就需要公告费500元，而开办一家企业的平均费用仅为200.5元左右（李德洗和张晓波，2017）。 [↑](#footnote-ref-13)
14. 考虑到我国非法人企业的税收成本低于法人企业的现实，更合理的避税方式是企业主再成立独资和合伙企业（非法人企业），以转移其法人企业税收成本，因此，当非法人企业税率进一步降低时，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非法人企业进入率的增加可以认为是避税动机驱动的了。 [↑](#footnote-ref-14)
15. 将企业进入率在省份层面进行加总，一是为了与现有文献进行呼应，如李俊青（2017）、唐钰和封进（2020），二是省份内部企业所适用的税收政策和征管水平具有一定相似性，这些因素会对企业的实际税负产生影响。 [↑](#footnote-ref-15)
16. 利用改革前年平均“税基转移型”企业进入数量乘增长率计算得出，表示“税基转移型”企业每年的增量而非存量。 [↑](#footnote-ref-16)
17. 为支持海南自贸港发展，2020年6月出台了“两个15%”所得税优惠政策，规定2020年1月1日起，对在海南自贸港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而且不分境内境外人才；对注册在海南自贸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19年1月1日起，对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对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超过15%，予以免征，适用范围包括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和肇庆市九市。 [↑](#footnote-ref-17)
18. 2020年2月1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做好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市监注〔2020〕8号），鼓励市场登记全程网办，详见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3/content\_5474268.htm。 [↑](#footnote-ref-18)
19. 合伙企业经营所得按照“先分后税”的原则缴纳所得税，根据财税[2008]159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中第二条规定“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 [↑](#footnote-ref-19)
20. 2021年北京市等开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即批准”政策试点工作，备案制压缩了审核时间，大大方便了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红利，可能导致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发生变化，影响税基转移的估计结果。 [↑](#footnote-ref-20)
21. 鼓励类产业企业指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60%以上的企业。这一目录于2020年11月通过修订，并自2021年3月起按新修订目录实施，可能造成西部地区税收优惠企业数量趋势发生变化。 [↑](#footnote-ref-21)
22. 注册资本0-50万为微型企业，50-100万为小型企业，100-500万为中型企业，500万以上为大型企业。 [↑](#footnote-ref-22)
23. 巴基斯坦合伙企业与个人独资企业都按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但适用税率不同。 [↑](#footnote-ref-23)
24. Bilicka（2019）发现在英国经营的外国子公司零利润企业占比显著高于国内企业，间接说明存在国际间的税基转移。Langenmayr & Liu（2023）通过检验英国实施属地原则后跨国集团国内子公司报告利润显著下降证实了税基转移。二者均通过跨国公司在高税率地区的报告利润减少来推断企业间存在税基转移，本文借鉴这一做法，通过比较有转移“通道”的法人企业和没有转移“通道”的法人企业利润差异推断跨组织形式的税基转移。 [↑](#footnote-ref-24)
25. 第（5）列利润总额为负，没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有些小微企业存在核定征收的缘故，这类企业账簿不健全，填报利润等财务指标时比较随意，相较于查账征收的企业，报告利润可能不太精确。 [↑](#footnote-ref-25)
26. 税基转移意味着企业所得税税基流向个人所得税，此处仅计算了企业所得税流失部分，并非税收的净损失。 [↑](#footnote-ref-26)
27.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2019年企业所得税年均实际收入总额为36313.47亿元。 [↑](#footnote-ref-27)
28. 将非法人企业资产的估算收益视为资本收入征企业所得税，剩余收入在分配给所有者使作为劳动收入征个人所得税。 [↑](#footnote-ref-28)
29. 比如美国对企业组织形式转化次数加以适当限制，规定C型和S型公司的转化频率不得超过5年一次。 [↑](#footnote-ref-29)